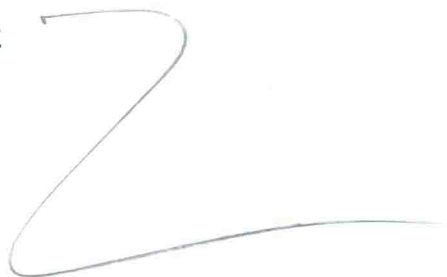




大院建筑与文化艺术

任丽俊◎著



大院建筑与文化艺术

任丽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院建筑与文化艺术 / 任丽俊著. — 长春 : 吉林
美术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75-3161-4

I. ①大… II. ①任… III. ①民居—建筑艺术—介绍
—山西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1216号

大院建筑与文化艺术

DAYUAN JIANZHU YU WENHUA YISHU

著 者 任丽俊

责任编辑 于丽梅

装帧设计 海星传媒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9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75-3161-4 定价: 68.00元

前言

晋商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商帮，号称十大商帮之首。山西商人在明清至民国初期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金融领域的辉煌，而且创造了适合他们自身生存环境的聚落及其民居形态。据统计，山西省境内保存基本完整的晋商聚落，包括集镇或小城镇、村落等，大约有1000处。商业集镇或小城镇及其店铺、作坊、住居等混合式民居是商人们劳作与生活的场所，周边环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商业运营的特点；商贾村落及其民居是商人和他们的眷属生活享乐的场所，该场所主要体现出一种血缘关系和商贾意识相互交织的环境氛围。

晋是山西的简称，山西在历史上曾是古晋国的属地。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实行分封，周成王姬诵将征讨得来的一块领地——唐（夏墟唐尧后裔古国）封于其母弟姬虞，即唐叔虞。山西太原的晋祠就是为纪念唐叔虞而修建的祠庙。叔虞之子燹父即位之后改唐为晋，从此称晋国。晋商指山西商人，尤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据文献记载，自春秋时期晋商在中国即有一定影响，从春秋至元朝末年，晋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商帮。明清时期，晋商开始全面崛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晋商民居泛指山西商人生活、居住的处所，特指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居住处的历史遗存。山西商人和其他各地的商人一样，大多数都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创业历程。他们在本地或外埠经营生意，修筑商铺；会聚同乡，修建会馆；捐献资金，建造庙宇，等等。事业有成，荣归故里，山西商人便在家乡修建豪宅，享乐园田生活。至今，山西境内仍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经营过的集镇和居住过的村落，保留着许多巨商富贾们精心营造的深宅大院。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一节 晋商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二节 晋商聚落与晋商大院.....	7
第三节 晋商聚落与大院的影响因素及区位划分.....	21
第四节 晋商大院及经营场所的建筑文化.....	34
第二章 王家大院的空间组成及技术经验分析	59
第一节 绪论.....	59
第二节 王家大院的群体布局特色.....	65
第三节 王家大院的空间组织.....	71
第四节 王家大院的建筑装饰.....	87
第五节 王家大院的技术经验浅析.....	96
第三章 榆次晋商常氏大院	104
第一节 晋商巨贾常氏及其文化背景.....	104
第二节 常氏大院原始形态及其演变.....	114
第三节 常氏大院现状分析.....	128

第四章 晋商堡式大院——太谷曹家大院	136
第一节 曹家大院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	136
第二节 曹家大院的空间布局与建筑形态	139
第三节 曹家大院的建筑审美特征	156
第五章 晋商山地聚落民居——阳泉银圆山庄	174
第一节 阳泉官沟村张氏及其银圆山庄	174
第二节 银圆山庄的布局特点	177
第三节 银圆山庄的民居建筑形式	183
第六章 晋商文化影响下的晋商大院建筑样式详解	188
第一节 居住主体社会性来看晋商建筑中的特征	188
第二节 晋商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	191
第三节 文化与建筑的互动中介——设计者	198
第四节 银圆山庄的空间组织与形态特征	200
第七章 山西晋商大院的建筑形态研究	204
第一节 晋商文化与晋商大院的融合	204
第二节 晋商大院的建筑形态分析	210
第三节 建筑形式	230
第八章 晋商大院“三雕”图案艺术研究	240
第一节 晋商大院“三雕”图案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240
第二节 晋商大院“三雕”概况	243
第三节 晋商大院“三雕”图案题材与文化内涵	254
第四节 晋商大院“三雕”图案形式美法则	261

第九章 晋商大院宅门装饰艺术研究	265
第一节 晋商大院宅门装饰艺术概况	265
第二节 晋商大院宅门装饰艺术之美	271
第三节 晋商大院宅门装饰艺术之道	275
第十章 晋商大院室内空间与装饰特色研究	277
第一节 晋商大院室内空间与界面装饰特色	277
第二节 晋商大院室内空间装饰的审美理念	283
第三节 晋商大院建筑装饰的艺术成就	286
参考文献	290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晋商的起源与发展

在历史上，区域经济的崛起须具备三个重要条件，即资源、交通和商人。资源指地方的经济资源，也是区域经济贸易的资本。交通是区域对内对外经济贸易的脉络，是地区与地区之间资源往来的通道。商人则是区域经济贸易活动的直接发起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商人在地方之间经济资源往来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另外，区域经济崛起也需要一定的机遇。例如，朝廷适时颁布的一些政令，地方上的需求信息等。

一、山西在历史上的商贸资源

在历史上，山西境内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其中首推盐、煤、铁等矿产资源。运城盐池的“河东盐”，早在西周就已经被开发利用，战国时期有了发展。运城盐池是古代湖泊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盆地之最低处，湖面海拔320米。《新唐书·食货志》载：大历年间，盐池每年税收达到150万，占全国盐利收入的1/4，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8。《宋史·食货志》载：庆历年间，盐池的盐产量达37.5万大席，每大席重220斤，合盐8250万斤，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唐、宋时期，河东盐已经销售到了今天的河北、陕西、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

山西在历史上还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产资源。据《史记·孝本纪》记

载：“黄帝采首山铜。”首山即山西南部的首阳山，……在“蒲州老城南”。这说明，早在黄帝时期山西就掀开了铜矿开采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铜矿在山西境内的分布为：悬瓮山（今太原）、少山（今昔阳）、白马山（今孟县）、鼓镡山（今垣曲）和倭山（今蒲县南）等地。

山西境内铁矿资源丰富，南北皆有，以南部开采为多。明代以前山西的冶铁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排名。明洪武七年（1374年），“命置铁冶官所，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一员，秩正八品；副史一员，秩正九品”。全国共有13所，山西就占有5所，即“山西平阳府吉州富国、丰国二冶；太原府大通冶；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由于撤销了冶铁所，变官冶为民冶，山西的冶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铁货产量成七八倍的增长，铁矿产地也遍布省内晋城、长治、太原等31县。

山西的煤炭资源驰名中外。煤炭的开发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唐以降，煤炭的开采已经非常普遍了。在古代，由于受到道路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山西的煤炭不能大量外运，主要用于就地燃烧加工地方产品，如炼铁等。山西省长治县荫城镇是明清时期铁货交易的主要集散中心。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荫城铁、荫城碳，离开荫城不能干。”这充分反映了煤炭资源对于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另外，山西历史上还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这些都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山西的商业交通

路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寻求美好的生存环境，“劈山通道，剡木为舟”，秦汉的驰道，大唐的贡路，宋元的驿道，明清的官路等，均为我国各朝各代各个区域之间的人员交流、物资交流、文化交流以及信息交流等各项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沿路的聚落由封闭落后的农耕部族走向开放进步的文明城镇提供了先决条件。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崇峦叠嶂，沟壑纵横，起伏的山川河谷无形中将这块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割成了一个个互相隔绝的区域。《读史方輿纪要》对山西的地势是这样概括的：“山西之形式，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勾注山、雁门关）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均在山西南部，统称中条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汾河、浍水）芸流而右，漳、沁（漳河、沁水）包络于左，则原隰（低下的平原地带）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山西凭借这种优越而险要的地理形势，对内可以致力发展生产，对外可以攻守兼备。春秋时期的晋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五霸之一，这与其所占据的这块有利地势是分不开的。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区域界线逐渐被打破，区域之间渴望交流，山西与外界也需要沟通，因而连通这些区域，或通向境外之道路交通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在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在位期间，就采取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的政策，即减轻关税，平整道路，开设商贸，宽待农夫。“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诸戎开道，以匡王室”，解除了来自北方戎狄的后顾之忧，继而向东南打通了晋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并因此而成就了霸业。晋国与秦国也因水路的“泛舟之役”而结盟，成为“秦晋之好”。

千百年来，山西民众为该地区道路交通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到明清时期，这里已经形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大型交通网络——东出娘子关通京城，南下黄河走洛阳，西过蒲津去西安，北跨长城接塞外。这样的道路交通格局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时至今日也有许多道路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的。

道路的通顺，给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增加了区域物资与信息的交流，特别是山西连接京城北京与古都西安的通道，是全国交通网络上的一



条重要道路，对带动山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沿线都市和乡村是直接的受益之地，经济都很发达。特别是集中在山西南线的一些古都，如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晋国绛州（今山西曲沃）等地，历经数千年，经济仍然兴盛不衰，其原因就在于作为这些地区经济命脉的道路交通始终在运营着。

三、山西的经商人群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明清时期，“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其最高总部大都在山西的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其随笔《山居笔记》中的感叹之词道出了山西商人当年的荣耀和辉煌。

历史上商人通常被视为市井之徒，故史书中少有记载。而且，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商人这一社会阶层总是被作为置道德与良知于不顾，拜金思想浓厚的典型。商人见利忘义的鄙陋行为和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被大肆地渲染。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雕梁画栋、妻妾成群似乎成了商人的写照。然而，很少有人提及商人艰辛的创业之路。殊不知，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为艰苦和残酷的。很多商人最初以一副担子、一辆推车起家，他们在酷暑与严寒中挣扎，为赚取一点蝇头小利而离妻别子，长途跋涉，少则两三年，多则数十载。更有迫于宗族势力而行商者，致富后，又多受乡党剥削，到头来竟一文不名（王兆祥和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商人》）。商人所选择的，是一种富于竞争的生存方式；商人所行进的，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坎坷之途。

山西商人就是这样艰难地走过来的。历史上，在各朝各代，各个地区都能依稀找到一些山西商业活动的迹象，如商代，“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后期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109枚，海贝112枚”（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战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邑中一般“市列成行，店铺林立”（引自《史记·

赵世家》),等等。关于山西商人的详细记载,也多见于史书,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春秋时期晋国猗顿,在山西猗氏一带经营畜牧业,“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此拟王公,驰名天下”。又如《新五代史》载:北汉国刘旻,即位于晋阳后,因“国用日削”,曾依靠五台山僧人继颢的财力辅佐北汉国财政。继颢“为人多智,善商财利”,并在“柏谷(今山西长治北)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等。历史上关于山西地区商人群体的描述,如《北史·魏诸宗室传》载:“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者,可见小民从事货易者多矣”等。可见,山西地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山西商人聪颖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为全国乃至世界所认可。

四、明清时期山西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一个区域,商业贸易的繁荣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同时商贸繁荣也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山西曾出现过多次经济发展的高潮,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与尧、舜、禹都会城市的建设,战国、秦、汉时期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古都晋阳、长子的建设;隋唐时期矿业、手工业经济的繁荣与晋阳、河中,绛州城池的建设等。这些都说明了山西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和周边乡镇的商贸兴盛之关系。

然而,历史上山西真正商业贸易繁荣的黄金阶段,则是在明清时期。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此期间,山西因煤炭、铁矿的采掘、冶炼、纺织、酿造、制盐等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山西地方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另外,“招商采煤”“开中盐法”等政令的实施促成了一代山西商帮的形成,山西商帮的崛起也推动了地方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一) 采矿及手工业的发展与集镇的繁荣

山西虽说是“土瘠水深,风醇俗厚”(清乾隆《长治县志》)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但煤、铁、盐等矿产资源却十分丰富,尤其是煤炭,“南北诸山皆产之”(清光绪《山西县志》),采掘业遍布全省,明清时期官府与民间共同经

营，再加上清乾隆年间允许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招商采煤”（引自《东华续表》），运销市场也逐步扩大，活跃了山西经济。铁矿，明清时期开采和冶炼遍布25个州县，无论规模和产量，还是冶炼技术，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如兵器、大缸、铁锅、铁钉以及农耕器具，受到上自朝廷政府、下至黎民百姓的青睐。山西省长治荫城镇作为该地区铁货交易中心，清乾隆年间“年交易额就达二百余万元”（引自《中国实业志·山西省》）。

明清时期，山西省除了冶炼业外，其他手工业如纺织、陶瓷、琉璃以及酿造业等都显示出了精湛的技艺。山西潞安一带的潞绸天下闻名，丝毫不比江南丝绸逊色，高平市米山镇的刺绣产品远销美国及东南亚，该镇也因此而久负盛名。陶瓷业，山西汾阳山泉镇的法珐器，其烧制工艺广为流传，以至于到后来江西景德镇所烧的素三彩珐华器，也是由此仿造的。

由于山西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明清时期不但旧城市和集镇大长元气，而且涌现出不少新的集镇，仅长治地区“县之村成市集而为镇者”就达15处之多。各地市场、集镇蜂拥而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二）山西商人的崛起与地方城镇的发展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清光绪《五台新志》）。因土地不够耕种，剩余劳力涉足商业，在山西是一种传统风气；另外，矿业和手工业产品资源的丰富也给山西商人的崛起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因此，自宋代起山西各地就有商人活动的足迹。然而，山西商人经济最活跃期却是在明清时期，明万历年间朝廷颁布的开中盐法（一种食盐专卖的法令）在山西首先实行，给山西商人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良机，他们率先进入了北方边镇市场，做起了粮盐生意，并随之逐步扩大自己的经营实力与商业范围，棉、麻、丝、茶业兴旺，继而又有实力雄厚者从事金融汇兑业务，办起了票号，并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帮派势力，雄踞海内。例如，以祁县乔家为代表的晋中商帮，白手起家，苦心经营，至后来票号业务遍布全国及日本、俄国和东南亚，而他们所

在的家乡，祁县、平遥、太谷、榆次一带则更是买卖兴隆，店铺林立，小城镇商业体系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山西介休县市张兰镇，原只是一个小村落，由于是晋中商人的根据地之一，因而“商贾复四方，福源如大邑”（清嘉庆《介休县志》）。

资源、商人、机遇的结合，崛起了一代晋商，而晋帮商人的行为又深深影响到城市、集镇或村落的建设，他们精心为自己修建在家乡的宅第则成为山西民居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第二节 晋商聚落与晋商大院

商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商期间背井离乡、走南闯北。小有资本之后，一些商人除了拥有创业之初的商业总号，还在其他地区设立分号，甚至开设加工作坊等生产基地。商人忙于组织货源，联系销售，四处奔走，“居无定所”。他们的生活足迹呈动态分布，然而又是有一定规律的，基本上是在他们的家乡、他们经商的市镇、组织货源的地区和各地区的中心城市等地往复穿梭。晋商中的大部分成功者即是如此。例如，民国初期山西太谷著名书法家赵昌燮的祖上，“经营商业，兼顾农事。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其七世曾祖辈在徐州、杨山开设了当铺。当时，徐州、杨山一带社会秩序混乱。许多富商大贾、殷实之家为防劫盗，纷纷将贵重财物寄存于典当行，使得典当行兴盛一时，到了赵家八世祖父辈已殷富起来，于是又加入了山西太原的晋升栈、太谷的晋丰德、裕权德等铺号，经营棉纱、布匹、粮食等多种生意，专门从事起商业活动来。”商人在其走过的各个地区都将留下商业或非商业行为的印记，他们的居



所也将有选择性地定格在这些商业或非商业行为的印记之中。

一、晋商聚落

历史上，中国经历了漫长而超稳态的封建社会，各地区除了由于政治、军事、手工和商贸等功能需求而产生的中心城市之外，还形成了数量巨大、遍布各地、规模适中、变化缓慢的乡土聚落，包括集镇和村落等。商业贸易作为中心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活动区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不能贸然称其为“商业聚落”。集镇（包括一些小型的地方城镇）和村落等乡土聚落则不然，尤其是集镇，由于规模较小，商业贸易可能成为该聚落的主要甚至是全部职能。另外，商业人群原住聚落，主要指村落，虽然没有商业贸易的功能，但是由于受商人住民的影响，形态不同于非商业人群聚居的村落。晋商聚落主要是指山西的集镇，也包括一些小型的地方城镇，如县城等，以及有经商人群聚居的村落。

（一）村落——聚“族”而居

原始人类喜欢聚族而居，过同族的群体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我国早期的人类主要是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作为人类文化发源地之一的黄河流域文化区，山西省自然也不例外。从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山西“西侯度文化”“河文化”“丁村文化”，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等原始文化的遗存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器工具，以及原始人类粗糙的加工技术，从而了解到我们人类的祖先生活的遗痕，他们喜欢以族而聚，“择水而居”，并“沿水而行”，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此时，原始人类多半是居住在靠近水边的天然洞穴或简易的自然构筑物之中的。

随着旧石器的结束，人类完成了农业畜牧业的社会第一次劳动大分工。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揭开了人类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序幕，一些固定的居民点逐步出现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夏县西阴村遗址等，都属于新石器时代农耕氏族居民的聚居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则

农家老人为尧帝所歌的民谣，生动地描绘出这一时期原始人类生活的模式。与之相适应的固定居民点，即是人类早期的聚落——原始农耕村落。

山西省平顺县虹梯关：村落布置在东西走向的两山之间向阳坡上，呈阶梯形布局，村中央是一座“关帝庙”。两边第二阶台地上各有一眼水井，村落对面是狭长的田地……这样的村落封闭、向心，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和自足感，因而发展缓慢。

居民聚居的联系纽带是“血缘”关系。村落族人中若有外出经商者，实力雄厚，见多识广，在村落中修宅筑院，甚至将整个村落修筑“一新”，造福族人，如山西沁水县的西文兴村、襄汾县的丁村等。这样的村落打开了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但仍然不失其原有的内聚性和自足感。

（二）集镇——聚“贾”而居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新的生产技术与劳动手段层出不穷，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因而出现了剩余产品。与此同时，社会的生产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出现了众多的手工业部门，如制陶、编织、冶炼、加工等。因此，人类又实行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第二次劳动大分工。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打破了人类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经济模式，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乃至部落之间，剩余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出现了。山西怀仁县发掘出的石器加工场遗址，其加工的石器成品与半成品，石料种类多、数量大，远不是当地所能消耗掉的，这些显然是用来与别的部落交换其他生活资料的。另外，从殷墟考古中发掘出的遗物中看，许多物品如玉石、大龟、海贝等，并非当地之产品，乃是交换所得。图1-1为平顺县虹梯关村关帝庙。



图1-1 平顺县虹梯关村关帝庙

据专家论证，人类早期的交易活动很可能是在部族村落之间的水路，岸边或陆路上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多次用来进行交换活动的区域，或小型的村落，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资源条件的便利优势，逐渐地固定下来，成为市集，并且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而形成一种市集聚落——原始集镇。

《易经·系辞》中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